

文艺美学书系

RONGHEYUCHAOY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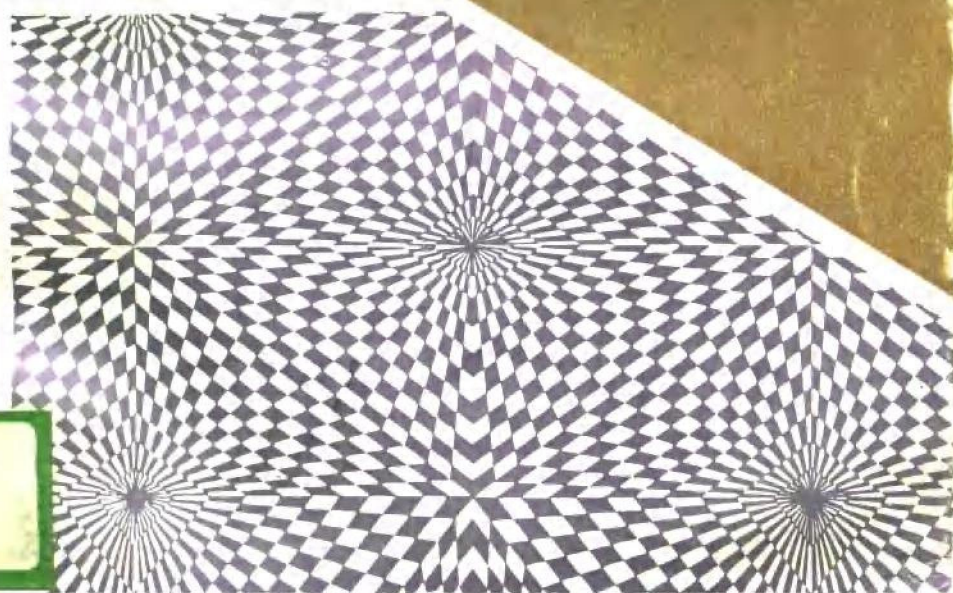
融合与超越

——新时期文学与外国文学

RONG HE

YU CHAO YUE

童志刚 张小东 夏武全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融合与超越

童志刚 张小东 夏武全 主编

融合与超越
——新时期文学与外国文学
童志刚 张小东 夏武全 主 编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插页 237 000字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500

ISBN 7—5354—0223—2

I·195 定价：3.70元

● 内容提要

探索，拓展，新时期文学已历十多年了，留下这样一条轨迹：解冻→反思→改革。由此文学也异彩纷呈，意识流小说，朦胧诗，寻根文学，性文学……

文学生成有其背景，生活，思想，人的存在才是文学的本体。然而还有世界文学思潮的激撞，我们也是世界的一员。而西方文学告别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早已领一代风骚……

影响总是交叉的，发展常常是平行的相似，这才是十年中外文学交流的角度与研究的角度。书系引进此比较文学专论，对我们的文学旨在观照自身，更期融合中超越。

目 录

序：热浪中的沉思〔陈美兰〕……………（1）

新时期先锋文艺创作与西方现代主义

创作过程论：发生·思维·物化……………（9）

先行的内在经验与传达方式——非
理性的感觉心态及其倾泄——向内转的
叙述方式〔陈 晋〕

新时期文学与苏联解冻文学……………（25）

转折·自由·收敛·振荡——人道主
义文学浪潮——“第四代”作家与“第
五代”作家〔曾文经〕

中国的“劫后文学”与日本的“战后文
学”十年：世纪的冲刺（节选）……………（40）

异同的表象对照——第二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在新的冲刺之前（略）

〔夏 刚〕

战争文学三层次论中国、苏联、美国战争文学比较：……………(60)

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英雄主义
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与黑色幽默

〔李 劫〕

寻根文学与拉美“爆炸文学”：文化的制约和文学的选择……………(77)

文学的诱惑和文化的困惑——孤独感·孤独意识·孤独的文化圈——现实主义·神话·时间模式〔张小东〕

新时期小说艺术形式的嬗变与欧美现代小说：超越模仿……………(94)

引言及结论：必然的模仿和超越的必然——体裁：从无到有的追溯——结构：松散与严谨的置换——语言：在缭乱的背后——手法：拿来·改造·创新

〔童志刚〕

中国新时期作家与萨特：哲学隔膜中的文学认同……………(111)

萨特与中国——自由·选择·责任——“他人就是地狱”——“反英雄主义”——未来：中国作家与萨特

〔黄忠晶〕

原始主义与寻根文学：人类文化进程的文学反思……………(126)

西方原始主义文学的特征和背景——新时期寻根文学的三种模式——艺术思维及表达方式上的共同趋向

〔方克强〕

中国与西方女作家小说创作比较：痛苦的文学幽灵……………(137)

醒来的痛苦——自主的呼号——

卑者的观点〔程文超〕

当代中国新诗潮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
在融合中铸造东方的现代诗魂……………(152)

理性与非理性：哲学背景——溶入

与走出；技巧实验——独创与信心；瞩望

未来〔李 黎〕

突破中的话剧与西方现代主义戏剧：表现与理解……………(169)

反传统·多样化·开放型——内心

化·哲理性·“表现”型——时空转换的

自由度——接受者的主体意识——差异

点〔方 方〕

当代中国与美国、苏联纪实文学比较：
这里，喧响着不同民族的历史步伐……(187)

历史背景的鸟瞰——艺术形态的分析

——审美价值的透视〔李运抟〕

北岛与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对现实的超越……………(203)

象征：一个独特世界的建立——超

现实主义；无意识阈下的自我发掘——白

日梦；两个世界之间的永恒困惑

〔毕光明〕

莫言与马尔克斯：现实的新的解读方式：魔幻……………(216)

幻象与现实的奇妙结合——象征。

隐喻的出奇创新——结构、视角的随意
独到——艺术领地的深入建造——传
统、现实与文化背景〔王国华 石 挺〕

**张承志与艾特玛托夫：从草原深处找到
旋律的两位歌手……………(230)**

“母亲——人民”为基本的主题
——忧郁的笑和激昂的歌——草原的
歌：叙事与抒情——“象征”：具象与意象
〔林为进〕

**《蝴蝶》与《喧哗与骚动》：王蒙的
“万花筒”与福克纳的“多棱镜”……(247)**

两面的世界与三层的时空——放射
性视角与对位式结构——逆转式挪移与
复调式互补——纵剖面投影与横断
层膨胀〔阳友权〕

**《西线无战事》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以特殊的视角进入战争文学……(261)**

“男性文学”：女兵的视角——英
雄主义：普通人的视角——战争描写：战
场外的视角〔宋致新〕

**《我是谁》与《变形记》：现代人自我
失落的痛苦……………(274)**

共通的人类情绪——特定的性格和
表现——潜在的影响和超越〔汪丽亚〕

**《车站》与《等待戈多》：走向新
观念……………(284)**

戏剧观裂变背景下的选择——走向新
观念之路——技法的意义〔夏武全〕

热浪中的沉思

——权且为序

陈美兰

历史行程匆匆，有时在人们尚未来得及辨清其来龙去脉，它就急速地转入了另一段新的途程，本世纪初出现的“五四”文学新潮，不正是如此吗？那种狂飙式的弃旧迎新的呼啸，那种面对西方文化大胆“拿来”，兼收融合的凌厉气势，曾经给已趋平缓沉寂的中国文苑掀起过一股多么滚烫的热浪。然而，当年的经事者，也许还未在漩涡中领悟到这股热浪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还未获得驾驭与驱动这股浪潮的深刻自觉，它就匆匆结束了自己的行程，——尽管它已经为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留下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引起了一次历史性的的大裂变！这种突然而来却又匆匆而去的历史文化现象，曾使多少后来终于走向自觉的经事者，

以及多少历史的后来者为之扼腕痛惜。倘若当年的经事者们在那种令人振奋的文化现象面前能够具备一种清醒的历史自觉，那么，中国文学在新的一段途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一定会更加辉煌。

也许正是这种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更容易唤起今天人们的超前意识和深刻的感悟力，所以，当眼前再一次出现这种声势浩大的文化碰撞时，人们的历史自觉意识的显现已大大超过了世纪初的当年。多少文学志士，怀着“世界文学走向中国，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宏愿，是那样兴奋地迎接着这股浪潮的到来，密切地注视着两种文化在碰撞、交融中出现的壮景奇观，敏感地追寻与预测着这种文学交汇的未来走向。在这当中，我们年轻的文学理论工作者们显得更加激进而活跃，他们凭着青年学者特有的敏锐感受力和在新的知识结构中迸发出来的透视力和剖析力，或作宏观审视，或从个体切入，立志要廓清这股浪潮的动势及其隐约可见的规律与趋向。也正是在这股新潮热浪中，志刚、小东、武全三位同志，萌动了要与校外一批年轻学者携手合作，共同走向这一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创造大面积研究成果的意念。很快，由于得到了真诚的回应，这种意念终于变成了现实，从而产生了这本集子所汇集的一批令人振奋的成果。

中西文学的碰撞与交融，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奇特的、因而也最容易激起人们探索冲动的文学现象。爆发于世纪初的那一系列著名的文艺论争，实际上就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由于这方面思考的冲动而展开的对待外来文化两种态度冲突的内容，然而到了今天，历史的实绩早已昭示于世，因此，如果再来进行所谓对待外来文化是“迎”还是“拒”之争，就实在显得多余而滑稽。我们许多富有才赋识见和开拓活力的年轻学者，早已超越这无谓的饶舌而直接走向巍巍矗立的文学景观本身，将眼光投向整个文化构架，审视其新的组合形式及其呈现的异采。这是在史历发展的环形阶梯上的一种新的视野。

中西文学的碰撞与交融，缘由于极为复杂的因素，远远不止是某些现象之间或某些单个作家或作品的平行比较即能穷尽其所具有的全部内涵的。在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时，我认为尤其需要有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每个国家的文学艺术，都有其独特的根基，我们很难把它从整个国家、民族在历史与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中所形成的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特有的心理素质中剥离出来，国别间的文学比较，必须要在历史的全景中进行，否则就会失去其应有的科学性，而带有过分的主观随意性。现在我们有些急盼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人，在谈论中国文学如何接受外域文学的影响时，往往片面地责难中国文学的羁绊太多而阻隔了对世界文学潮流的全面趋附，他们常常只赞扬那种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趋附力、模仿力，而不大愿意承认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学也必然具有它的消融力和重创力，起码，不愿意承认这当中还有其合理的因素。这种研究态度是值得考虑的。固然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示过，随着人类物质生产的世界性而必然导致人类精神生产的世界性，然而，这毕竟仅属未来趋向，现在首先需要的是全世界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达到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同时还需要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的长期的历史形成过程。把这样一个过程看得过分轻易、简捷，就必然会导致理论认识的偏颇，并因此而带来创作追求的偏颇。

历史上曾有许多现象不能不令我们深思。两千多年前，当佛教作为异域文化传入我国后，尽管不久即被奉为国教，可是，当我们认真地审阅一下佛教艺术从南北朝经越隋唐而至宋所发生的演化，就不能不惊异于作为中国本土文化艺术那种不可抗拒的消融力量。超凡脱俗的精神性逐渐走向对世俗人间秩序的认同，反理性的宗教迷狂，逐渐纳入了宁静的理性轨道，这是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第一次大汇通，其结果不是本土文化趋附于外来文化，恰恰相反，是外来文化消融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固然，它确

曾给我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注入了活力。这种情况在近代历史上也不乏其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国体的振兴和精神的解放，他们对外域文化的承受更加积极自觉，在弃旧图新的激进精神驱使下，“西方”几乎成了“新”与“先进”的代名词，西方文学一时成了中国有出息的文学家向往、学习的楷模。鲁迅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新文学是在外国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①。然而，中国文学最终仍没有与历史的传统和现实土壤断裂，没有走上西方文学发展道路（包括内容和形式），而只能是将西方文学和一些新的因素溶铸在自己的母体中。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学家们始终无法摆脱孕育他们成长的中国文化土壤在他们身上所留下的一切。美籍学者叶维廉在谈论“五四”时期一批作家时，有一段话是颇有见地的，“所谓完全否定传统常常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所有这些知识分子，胡适、鲁迅、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等等，受的都是古典文化的教育。所以，在文学上的表现或是社会思想形态的思考上，沉潜在他们下意识里的一些传统的美学观念和文化思想，仍然如鬼灵般左右着他们的取舍。就拿早期的郭沫若来说吧，他的诗歌特色常常是使用一连串顿呼修辞法，爆发性地歌颂自我，大声疾呼自己是彻头彻尾的离经叛道者。然而，就在他接受自由思想的同时，他又有意无意唤起道家思想作为中国的平行例证”^②。这点，对于今天仍然生活在中国文化生态环境中的当代作家们，恐怕仍有它某种警觉意义吧？！

我们在研究文学发生、文学偏离、文学选择这一系列问题和

①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②叶维廉：《历史整体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省思》原文载台湾《淡江评论》第10卷1—2期。

现象时，确实不能忽视和回避形成不同文学类型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这个最基本的内核。这种心理素质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不同民族在与自然、社会、历史三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不同特点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积淀层”。现在我们一般所说的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中国文化、西欧文化和印度文化，也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正基于此，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文化就是保守、落后的文化，我们不应把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排外、保守政策与中国文化的特点等同起来，完全当成一码事。如果我们能抱一种客观的态度，就不能不看到，这三个文化系统其实都有其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在基本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标准等方面，都有其不同的积极面和消极面。象人生追求上，西方人往往有着探索自然奥秘的强烈的好奇心和进取精神，这固然值得我们认真吸取，但居于东方的中国人，在“天地之化育”的感召下，实实在在的为日常之用而参与现实的营造，这种求实态度也未必全部不可取，它完全可以作为进取精神的一个重要补充；西方人善于将浓烈奔放的情感诉诸于精神境界，而中国人则善于将血缘情感与实践理性融为一体；西方人重理性思辨，而中国人则重于经验的直觉判断；西方人重个体本位，而中国人则重类本位、社会本位，等等。这些，都只能属各有长短，是在各种不同侧面上显示自己的优势，而不意味着某种文化系统最为完备。由此而铸成的文化特色，也自然有其各自的强处和弱点，而这种差异或对立本身，也就注定了各自的文学必然需要互相交融，互相吸取，才能获得新的超越。在这点上，它与世间万物的生存发展规律是一样的。鉴于这样的基本点，我们在考察中国文学接受西方文学影响时，就应该不是以其对西方文学的吸取量作为主要价值取向，而是应该着重去探究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和更复杂的因素，比如，中国文学在某个时期或某种构建中对外域文学某些方

面大量吸取的内在动机；中国文学在不同阶段的特殊需要使它在与外来文学融会过程中所产生的奇特变异；中国一些作家由于不同的潜在因素的支配而在对待外来文学影响时所作的不同选择，等等。深入地钻研这些问题，才会把我们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引向纵深处，引向高层次，才能从中发现一些真正属于科学的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才能在建立当代文化选择的价值坐标时，获得一个可靠的依据。可喜的是，在这本集子汇聚的成果中，尽管还有某些参差和微瑕，但毕竟已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这种研究的自觉，他们的思考和论断所及，对今人和后人深入认识当前中西文化交流这股热浪，是有其不容抹煞的价值的。

中国文学发展到了新时期，确实体现了一种巨大的跨越。这当中自然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中国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驱动，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其最基本的根源，而外国文学思潮的冲击，则又是最重要的诱发因素。但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文学在吸收外国文化方面，似乎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光从艺术手法来看，就相当直观地反映了这一点。几年时间，我们几乎把西方大半个世纪以来出现的新手法统统搬来，重演一遍，确使文坛热闹非凡。当然，艺术上是不能刻板划一，强行指令的，作家对此完全可以随心所欲，游情恣意。可是，从另方面来说，将人家几十年来在本土中孕育萌生的艺术之花，急匆匆用几年时间就几乎全部采撷，可谓“花团锦簇”矣，但却不能不使人担心它那极大的飘忽性。它反映了我们的艺术探索尚未建立起一个植根于我国传统和现实基础上的明确的价值取向。

较之于艺术手法的选择问题，新时期文学在与西方文学交流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种更为巨大的困惑，这种困惑涉及到对整个文学历史使命的选择和理解，尤其集中在文学对人的认识 and 表现上。由于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尚未出现过象西方文艺复兴至启蒙主义时期那样一种文学声势。西方这个历

史阶段的文学，异常集中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科学对人的第一次发现，在人和社会关系中认识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尊严、价值，人的力量，人的伟大。它对人的主题的强烈呼唤，使西方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的新高峰。而中国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面临着彻底反封建的相似的和迫切的历史任务，文学才大量地引进了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主义时期文学思潮的影响，在冲破束缚人的樊篱中，表现出一种勃发的活力。但随后，由于民族与阶级问题的尖锐化，所以，对人作为社会个体的尊严、个性，并未得以充分地发展，很快就转移到对阶级、民族的集合性的张扬和重视，无疑，这种转移，也是为实现人的个体的彻底解放，创造必要的历史前提，但还不等于在最终意义上真正承认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到了今天，当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需要进行重大变革，一个过去尚未彻底完成的历史任务，就自然横亘在我们国家、民族，也横亘在新时期文学面前：充分认识人的力量、价值和尊严，彻底否定阻碍人的个性、才能、智慧发展的种种桎梏。在步入新时期后，应该说，我国文学是异常自觉地担负起这种使命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明显效应的。

但是，当我们重新敞开大门的时候，今天西方文化思潮带来的却又是一种更新的内容。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使人对自身又有了一次伟大的发现。西方对人的认识早已不仅仅停留在人的外在力量上，而是进入到人的本体的研究，探索到人的内在机制，人的某些本能和潜藏意识和非理性奥秘，这就直接影响了文学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与西方文学交融时，主要就是接触这一部分。这样就很明显地产生一个矛盾：从中国历史发展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来说，我们的文学需要大力提倡、歌颂人的主体精神，高扬人的尊严和伟大力量，体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为人的进取、拓展，创造一切适应的条件；可是当前从外面投射进来的，却又大量是对于人的生命内部的许

多非理性、非崇高、渺小而荒诞的东西的执意追寻，并由此而弥漫着西方社会所特有的浓重的荒谬感、失落感和悲剧感。这两种力量的交错和撞击，也就不能不使新时期文学陷入巨大的困惑中。

这是一种历史的困惑，因此，它迫切地呼唤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作出回答。近几年来，我们不少作家自觉或尚不自觉地顶住某些舆论势力的压迫，在实践中作着勇敢的探索，力图找到历史的纵向要求与现实的横向影响的契合点。如果我们的理论研究，也具备这种敏感和勇气，真正在理论上给予有力的回答，那么，我们将要创建的文学，将是一个跃上了历史新的高度，即超越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时期，也超越于今天西方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学，它必将把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史推向一个更加灿烂、辉煌的境界。

道远而任重，人们对年轻的大学理论工作者们正寄予厚望。

1987年夏于珞珈山

新时期先锋文艺创作与西方 现代主义创作过程论：发 生、思维、物化

陈 晋

艺术的每一次变动，最终都要落实到推出具有新质的作品系列。但这只是结果，关键还是在于创作主体对创作过程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设计。新时期先锋文艺作品放出新颖、奇诡的光彩，与作者们另辟蹊径的创作过程密切相关。所谓创作过程，无非包括创作发生、创作思维、创作物化三个环节。如果把新时期先锋文艺的创作过程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创作观念对照起来考察，我们或许更能明晰它努力探索的实质意义。